

序 言

邹嘉彦

香港城市大学荣休讲座教授
香港科技大学专任教授

南洋是全球最多海外华人聚居的地方，其中新加坡和马来西亚是南洋各地华人与当地人口比例最高的地区；而新加坡更是中国以外华人人口过半的国家，在各方面都备受关注。郭振羽教授与罗福腾教授合撰的大作《多元和统一：新加坡的语言与社会》一书不但协助有心之士回顾史实，也为中外学者提供丰富的资料。书名上提及的“多元”和“统一”蕴含大自然和社会两极化的对比概念，而当两者之间过渡时往往或多或少会经历各种角力。如果体验过渡的是国家或社会，那么所牵涉的问题便更广泛，触及语言和相关社会地位、功能和调配、媒体操作、教育和行政设施的配合、社会阶层的变化和发展，以及政治方面的长期愿景和手段等。本书乃以语言和社会的角力成果作为主题。

过去一个世纪迭经巨变，包括两次世界大战和后殖民地时代衍生的许多新兴独立国家，有的建基于拥有多元语言文化及不同历史背景的单一民族或多元族群，甚至凭藉经济、政治、军事的崛起而蜚声国际。新加坡就是一例，此外，还有新加坡多方面奉为楷模的以色列。以下试图略为介绍两国兼备的特色。

首先，新加坡的国民来自亚洲东部的汉族、亚洲南部的德拉威族、亚利安族和邻近地区已长期定居的马来原住民族。不同的语言、宗教和民族社团，促成新加坡把原有殖民地时期的英语标新立异，构

成富有特色的“新加坡英语 (Singlish)”。以色列的国民来自欧洲各地、地中海、中亚和北非等地区，他们虽然大多是犹太人后裔，但是语言和宗教习惯都有显著差别，加上还有当地和邻近地区的阿拉伯人，所以独立时期的社会是相当多元化的。以色列的国语是新的希伯来语，是古希伯来语复兴后的新语言。两个国家的语言政策都相当成功，收获颇丰，值得深入了解。

其二，这两个地区的跨代居民在过去半个多世纪内经历过很大的变化，尤其是语言方面。本书详述新加坡建国后三代国民跨代的语言变化。还有涉及其它可供参考的亚洲例子，如马来西亚、香港和台湾，前两者的殖民地历史与新加坡相若，但成果不同。后者在一百多年内就历经过巨大的语言环境蜕变，其主流或官方语言从清朝的闽语，到日据时期的日语，至早期国民政府的国语（即华语），再到近年来官方地位日渐提升源于闽南语的台语¹。

新加坡历来有五种主要语言：英语、华语、闽南语（福建话）、马来语和淡米尔语，再加上数种次要的汉语方言，如潮州话、广府话（粤语）和印度的马来亚里语（Malayalam），但现在只有四种主要语言具有官方地位：英语、华语、马来语以及淡米尔语。上述这四种语言虽然都享有官方语言（Official Language）的地位，其中只有英语独具显著地位，政府经过详尽考虑制定政策，把复杂的多语言环境雕塑成一个语言地位有新架构规律的国家，所牵涉的政策和工作计划不只是个别语言的定位（Status Planning），还包括艰巨的语言本体标准拟定（Corpus Planning）。换言之，新加坡定位了华语以后，也拟定了语言本体的标准，包括字体、语音和用词。新加坡的英语标准也极受关注，相比之下以色列则只把一个式微的圣经希伯来语重新构建为新

¹ 可见 Tsou, B. (2019). *Sociolinguistic Aspects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Oxford Bibliographies in Chinese Studie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希伯来语，因此在语言本体标准工作方面多个范畴面对过不少相同的挑战，并且两者都下了很多功夫²。

其三，瑞士是值得和新加坡比较的另一国家。瑞士也有四种重要的官方语言：德语、法语、意大利语和罗曼什语（Romansh），其联邦政府的官方语言只有前三种，罗曼什语只是作为一些地区（Canton）的官方语言³。新加坡和瑞士之间的重大分别在于新加坡是个高楼林立的密集城市，它的语言不依地区来划分，只依各民族分布而定；而富于山川田园景色的瑞士，语言则依民族主要所在地而分布。新加坡虽然有四种官方语言，但其中只有英语是最主要的官方语言，而英语如同以色列的新希伯来语，国家独立时以它为母语的国民只占少数。

在层层挑战下，欲求厘定和推行成功的语言政策都属艰巨的社会工程（Social Engineering）。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新加坡、以色列和瑞士都属经济很成功的小国，同时也享有很高的国际地位。

以下且从新加坡的语言和政策之厘定与推行，略加剖析：

新加坡政策所定下的语言功能有别于其它国家，宪法上的四个官方语言有同等地位，但是基于实际考虑，国歌只有马来语的版本⁴，象征性地位很高，淡米尔文亦然。英语在政府运作方面是首要官方语言，也是实行教育与执行社会工作的首要语言。

新加坡很成功地利用语言政策把多个不同族群的社团融合成一个多元的集体社会，本书两位作者采用了多方面的可靠资料，分析新加坡从殖民地后期到独立后短短几十年的语言政策，让我们了解到新加坡如何运用社会工程把复杂分化和层次化的语言情况简化。本书在这方面提供了很多丰富详尽的叙述并做了深入浅出的详细分析，使读者

² 可见 Fishman, J. (1991). *Reversing language shift*. Clevedon: Multilingual Matters.

³ 可见 Schläpfer, R. and Bickel, H. (eds). (2000). *Die viersprachige Schweiz*. Frankfurt a/M: Sauerländer.

⁴ 可见本书第18页。

得以了解独立前后的变化，如立国初始的新加坡，最广泛使用的是福建的闽南语，其中有国民只会闽南语，以致早期军队需要以闽南语编排小队⁵，可见立国时期的语言问题相当繁杂。

语言政策不仅关乎个别语言的地位和功能，也需落实到具体的语言能力层面。本书也分析了成功语言政策的一些值得探讨的指标。

（一）华语识字率

新加坡语言政策的成功，包括几方面：（一）识字率提升；（二）家庭用语得以调整；（三）公共场合和工作用语得以调配。新加坡不只考虑华语识字率，还尝试推动多语识字率（multi-lingual literacy）。由于这方面挑战性强，多语识字率的定义和运作比单一语言还要复杂，很多国家都裹足不前、成效不著，多语的国家如比利时、瑞士、加拿大和爱尔兰都罕见探讨双语识字率能力的深入研究。

独立后新加坡的华语识字率已有所提升，情况值得与其它主要华语地区作比较。二十多年前曾经有比较新加坡、香港、台北和上海的中学、大学生识字、识词量的研究⁶，结果显示新加坡学生逊色于香港、台北与上海的学生。这项多年前的比较结果原因众多，值得有更合时的比较。

（二）家庭语言

若需要了解一个社会跨代用语情况，最好是观察同住的三代同堂有代表性的家庭，有鉴于引发隔代用语差别的推动力来自官方，而非民众社群，隔代用语的差别情况可与社会的演变复杂性成正比。

⁵ 可见本书第30页。

⁶ 可见邹嘉彦、李行德、童哲生、关笑芳、区洁心，《如何制定香港学生语文水平参考基准：四个亚洲城市中学生和大专生中文词汇能力发展——比较研究》。香港：香港城市大学语言资讯科学研究中心，2000年。

新加坡政府提供了从1980到2020时段的官方资料，两位作者得以对过去四十年三代家庭用语情况作出各种分析，从而了解跨代家庭用语改变的情况。两位作者也尝试从新加坡独立前的资料来追溯当地早期家庭语言情况。香港人口普查也提供同样资料可用作赋有意义的共时比较。也方便了解中国境外方言自然式微、陆续被取代的情形⁷。

（三）语言和教育政策

新加坡的语言政策包括教育方面第一语言的定义与众不同，所指的并不是学童的母语，而是国家首要的语言。学童自幼到初小四年级主要以其母语来学习，亦即华语、马来语或淡米尔语，学校并不以语言和族群分流独立教学。直到学童五年级才采取一致的教学制度，并以第一语言为主导。新加坡也制订了一些自己识字率的要求。值得注意的是，当学前的家庭语言和入学后的语言有所不同，可引起不少困扰。华族过去主要母语是方言，因此需要考虑到学前的家庭语言如何过渡到学校的语言教育问题。在这种有差距的情况下，如何厘定和衡量学童语言能力的进度发展，就成为一大社会问题，香港曾用上三年半来制定一份语言能力评估量表⁸，当前新加坡的语言情况已趋定形，可能也有向这方面探究考虑的价值。

（四）媒体政策

新加坡的媒体政策配合了教育和其它方面政策以推行官方语言，因此官方媒体只播放华语节目而停止其它方言节目，但政府未尝阻挡国民收看邻国马来西亚播放的华语方言节目，以致没有杜绝方言接

⁷ 可见邹嘉彦、游汝杰，《汉语与华人社会》，香港：香港城市大学出版社，2003年。

⁸ 可见邹嘉彦、李行德、张显达、童哲生，HKCOLAS: Hong Kong Cantonese Oral Language Assessment Scale（香港儿童口语（粤语）能力量表）。香港：香港城市大学语言资讯科学研究中心与香港特别行政区卫生署，2006年。

触，这种正式和非正式政策起了交错影响，使华语方言仍有存在空间，但不足以阻止新加坡方言能力下调，而国家仍可成功推行华语为华族的第一官方语言。

新加坡新传媒（Mediacorp）属下亚洲新闻台（CNA）用多种官方语言播放各种节目，而最成功莫过于英语台。尤其东南亚和亚太地区承受性颇高，应该不亚于澳大利亚广播电台业绩。更重要是相比之下，华语台影响不及英文台，虽如是，新加坡所用英语的标准备受国内的关注。

（五）华语运动

为了推动公共场所使用华语，政府大力推出华语运动，本书也作了很详尽的描述。这个运动的成效颇丰，新加坡年轻一代比老一代更倾向使用华语，是为该华语运动明显成功之例。另外有调查成果显示，家庭和年轻一代逐渐放弃了他们祖辈所用的汉语方言，而同时日常用语亦倾向以当地英语为主⁹。这种英语取代华语为家庭用语的趋势，足以令我们反思，很值得再作进一步探究。最后到底是得是失¹⁰，成效如何，则只可从长计议了。

（六）新加坡的英语和华语

由于英语的国际重要性，新加坡长期推行以标准英国英语为上的政策，而具本地特色的英语则广泛被国内与国外标志为“非常新加坡（Uniquely Singapore）”¹¹。从历代领导人公开讲演和谈话，到CNA的英语广播和海外的新加坡国际学校，甚至新加坡派遣队伍到蒙古和

⁹ 可见本书第183页等多处地方，值得注意的是，所指的英语是根深蒂固的新加坡式英语（Singlish）。

¹⁰ 甚至可有“文化太监”之虞。见罗德、邹嘉彦，《语言炸弹》，香港朗文出版社，1984年。

¹¹ 可见本书第55页。

中亚地区推展教育企业¹²，所用教学英语也或多或少呈现显著新加坡特色，这种“新加坡特色英语”虽不为国人广知，已经享誉国际，群众社会亦引以为荣，但决策者尚无足够信心接受此等荣誉。试问澳州人、美国人与爱尔兰人莫非都以自己的独特英语引以为荣吗？牛津英语辞典也收录了新加坡英语的 *kia'su*（源于闽南语的“惊输”，意为“怕输”），显示出新加坡英语的独特地位。各族群的语言标准都源于多元的境外文化，无助于统一。惟独英语不属新加坡任何大族群的母语，因此顺理成章地成为各族群共同新标志。

相比之下新加坡华语虽然已发展到颇有特色，但仍不足以构成当地华语的新标志。然而，鉴于新加坡多方面的国际地位，应该有足够条件接受现况让英语自成一格。现在已远离后殖民地时期，发言时无需青出于蓝以当权者的高水准语言争取上风，可考虑的因素有别于其它语言。近期官方媒体广播节目已出现耳熟能详的新马华语，可为未来发展的课题。归根究底，新加坡英语亦分“高层语言”和“底层语言”，它们的分工是否有足够内在与外在因素促使决策者排除忧虑而重新考虑英语的定位将是个较迫切的问题¹³。

¹² 可见新加坡驻蒙古人民共和国大使馆回顾两国50週年外交往来：<https://singapore.embassy.mn/eng/index.php?moduls=12>；亦可见“Kazakhstan and Singapore's strategic partnership strengthens by \$2BN” 21 Nov 2018 “In addition, the Singaporean-standard International School KinderWorld declared its plans to build and operate schools in Astana and Almaty...”：

<https://www.cnn.com/advertorial/2018/11/21/kazakhstan-and-singapores-strategic-partnership-strengthens-by-2bn.html>.

¹³ 可见本书第50页：“由决策者的立场看来，新加坡国小人少，不论是那一种语言，都不足也不当自成一特有的标准体系。如果坚持以本地特色的语言用法做标准，无疑乃是在语言传播上自绝于外世。”。亦见本书第55、56页：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政策研究院2020年6月15日发布大型语言调查报告，其中部分数据也支持新加坡式英语正在逐渐被很多人使用、认同和接受。该报告在2018年向4000多名属于不同族群的国人了解他们对种族、宗教和语言的看法，其中45%的国人认为，新加坡式英语是本地文化重要的组成部分，讲“新加坡式英语”可以让它们有作为新加坡人的身份认同感。

新加坡的社会语言历经三个主要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殖民地时期，即每个族群各以自己的“高层语言”和“底层语言”组成的“双层语言”（Collective Diglossia），并以此形成了“双层语言”群体。华族的家庭语言是以方言为主，而社会教育语言就分别是英语和华语。国家政策是把三个不同族群引领和聚合成一个大团体，大家除了有各自专用的社会“高层”、“底层”的语言，也接受英语是“顶层语言”（Supreme Language），这便是第二个阶段三层语言（Triglossia）¹⁴的社会情况。这个阶段就很明确地把英语变成所有国民最重要的“顶层语言”¹⁵，可是各族群还有自己原有的“底层”语言，他们还在教育、媒体方面维持本族群的语言环境，只是这种三层语言社会特别加重了华族因为有方言背景负担，因此并不理想。政府想把其中一层摒除以减少负担，使华人族群无需面临三种语言（即方言母语、华语和英语）的挑战，由此嬗变成最后的第三个阶段：一个新的“双层语言”系统，由大家共有的社会“高层”语言（即英语）及各族群的一种“底层”语言构建，华语因而取代了以前的方言。新加坡这方面的社会工程相当成功。与之相比，传统中国大陆上世纪也把三层语言社会协调成新的“双层语言”社会，与新加坡不同之处是中国把非官话区的各族群“高层”语言降为“底层”语言，而无需减少语言。中国和新加坡在人口和面积上虽然相差悬殊，但是两个国家都从繁杂的“三层语言”社会成功过渡到新的“双层语言”社会个体，显然有异曲同工之妙。

本书的华语书名为“多元和统一”，而英文是“Unity in Diversity”，两者有显著的对比，颇含深义。英文书名反映了对国外读者来说，

¹⁴ 可见 Tsou, B. (1983). “Triglossie et Réalignement Sociolinguistique.” *Contrastes*, 10–15.

¹⁵ 可见 Baetens-Beardsmore, H. (1983). The “Supreme-Language” Hypothesis applied to Brussels, in *Theory, Methods and Models of Contact-linguistics*, Nelde, P.H. Nelde (ed.), Bonn, 15–29.

新加坡具备融合、团结、大一统的一面，却也表明其语言、文化皆来自“多元”的背景。华语书名却标志着“多元”的背景和“统一”的共时现状，两者相辅相成。足见两位作者撰书时匠心独运，饶有深意。

新加坡独立伊始，具有天时、地利，独欠人和，此乃种族内外和谐关系与半世纪内殖民地时期分别管理政策甚至离间政策所致。今天新加坡得以从第三世界快速跻身高度开发国家之行列，受惠于成功的社会工程、独特的政策智慧和睿智的行政手段¹⁶，在国际上享有盛誉，令人刮目相看。

本人一甲子前在新加坡求学受教，亲身经历过部分独立前后社会动荡与各阶层角力的局面，后来也曾回家省亲和公干，寒来暑往数十载，如今蓦然回首，喜见故园如今已成为华人之光。郭教授是位卓越有成的社会语言学家，缘于多年同道中人，一向深知其经年殷勤耕耘之功。如今欣悉罗教授加入团队行列，两位作者不畏艰辛，将长年累月治学心得兼融并蓄，采各家之言，作一集大成的系统总结，付梓出版，拜读之下深感巨著承载多元文化大意与传承价值，实为功德无量，可喜可贺。承蒙两位教授邀约作序，能见贤思齐，以局内人变身旁观者略述己见，诚为乐事。在此，期盼英语版早日推出，以飨全球读者。

2022年6月7日于香江

¹⁶ 甚至新加坡公务员团队由于公私利益分明，并与其它国家相比能出淤泥而不染而享誉世界。